

华夏风云丛书·后浪篇

无价的遗产

编者：秦晓鹰等



华夏出版社

华夏风云丛书·后浪篇

无价的遗产

华夏出版社

1987年·北京

《华夏风云》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问编审:温济泽

主 编:秦晓鹰

副 主 编:戴 晴

编 委: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邱 建 铁竹伟 秦海波

秦晓鹰 黄继人 戴 晴

华夏风云丛书·后浪篇

无 价 的 遗 产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787×960 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02千字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5000册

ISBN7—80053—106—6/K·009

书号:11484·009 定价:1.05元

目 录

父亲的故事·····	陈晓鲁(1)
“李立三”，这个名字·····	李英男(19)
我们的爸爸——林枫·····	乐 林(39)
无价的遗产 ·····	贾虹生(48)
您与壮丽的青山同在·····	柯 非(67)
爸爸司马文森之死·····	司马小芹(83)
我的叔父叶挺将军·····	<u>叶钦和</u> (101)
父亲何叔衡在中央苏区 ·····	何实山 何实嗣(112)
总司令的女儿 ·····	洛 恪(122)
博古的孩子们 ·····	洛 恪(157)
从血雨腥风到阳光灿烂 ——访车耀先烈士的子女们·····	雷凌舫(168)

父亲的故事

陈晓鲁

说实话，在他生前，我并不感觉到他是个伟人。而如今活跃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的父亲陈毅的形象是那样高大、眩目和令人崇敬，以至让我感到有几分陌生了。父亲留给我的全部记忆，或许只是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，或许只限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幼稚肤浅的观察，但是它充满真情。它随着日月的消逝而愈见强烈，丰富着我对人生的认识。细细回味这一切，温暖着我、激励着我的，仍是那亲切平凡的父子之情。

父亲和我

我排行老三。小时候，仗着父母的宠爱，我非常任性。四岁时，家里送我进幼儿园，我硬是绝食三天，滴水不进，逼着幼儿园把我“开除”。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限度，他发作了。一天中午，父亲刚下班回来，听说我还没起床，顿时暴怒。他吼着：“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！”几步冲上楼，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，要从楼梯口扔下去。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。这位叔叔后来说：“从来没见过陈总发

这么大的脾气，可真把我吓坏了。”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。从此，我再也没让父亲为我生过这么大的气。

其实，父亲并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倒是我母亲的性子很急，常为我学习不用功而发火，父亲却经常从旁劝解。有一年寒假，我跟着父母去广东潮汕地区。母亲让我写一篇谈参观感想的文章，可我却犯了牛劲儿，死活不肯写。母亲忍不住发起脾气来。父亲劝她说：“慢慢讲，不要着急，他还是个孩子嘛。”母亲的气一下转到父亲身上：“都是你，平时宠他，现在一句话也不听了！”听了这话，父亲也不高兴了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管了！真是莫名其妙！”父母的争执是因我而起，也使我猛醒，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啊！这一夜，我逼着自己通宵未眠，把作文赶写了出来。也许是发愤之作，总有些可观之处，父母看了相视而笑，昨日的芥蒂在笑声中溶化。

平时，父母对我要求很严，我也从来不敢向父母提什么份外的要求。这么多年，我只求父亲为我办过一件事：我上初二时，老师要我请父亲为校运动会题词。我想了多时，真不敢向父亲开口，在他的门口几次欲进又退。最后还是父亲看见了，叫我进门问清缘由。他象是看穿了我踌躇的心理，格外和蔼地说：“儿子的要求一定要办到。”第二天，他亲自把题词交给我，还说：“不满意的话，还可以重写！”当时我高兴的真想跳起来啊！

父亲常爱用诗词来教育我。他给我讲解毛主席的咏雪词《沁园春·雪》时说：“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’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，就是毛主席说的‘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’你要牢记这一点哟！长大了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。”他还用唐诗“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”来说明革命成功之不易，告诫我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和地位上，要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。“不要忘本，靠自己。”这是父亲对我刻骨铭心的叮嘱，也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遗产。父亲酷爱作诗，每有佳作，也常告诉我们。有一次，他吟出一句“宇宙无限大，万国共一球”，颇为得意，说“等有了时间，要把下面的句子续出来。”后来，他用这句作开头，写了“示儿女”诗给我们。在他的熏陶下，我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兴趣。上高中以后，家里开始给些零花钱，每月两三块，我全用来买书，父亲发现了我的小书库，常来翻翻。逢有他中意的书，拿走前还要打个招呼：“这本不错，我先看看。”父亲爱看我买的书，我是十分引以为荣的。

下围棋，是同父亲相处最快乐的时刻。在棋盘旁一坐，父亲就收起了长辈的尊严，我也感到十分轻松。两人平起平坐，杀得难解难分。父亲爱悔棋。当然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我悔起棋来也是当仁不让。结果是他悔两步，我悔三步，经常互相拉锯。一次，母亲看我们下棋，见父亲悔棋，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：“和儿子下棋还要赖皮！”父亲装着没听见母亲的挪

输，还是照悔不误。母亲看不下去了，伸手搅乱了棋局。棋下不成了，父亲开怀大笑，“老了，不行了，下不过儿子啰！”

体育爱好者

父亲生性好动，少年时代就喜欢踢球和游泳。到60年代访问缅甸时，还同奈温总理赛足球，奔跑盘带，英姿不减当年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在新四军时，他就爱打篮球，就在黄桥决战的关键时刻，他还拿个球投几下篮。不过，我想那主要是为了安定军心，故示闲暇了。解放后，当了上海市长，他又学会了打网球、台球。有时打网球打得大汗淋漓，再跳到游泳池里游游泳，一面大呼：“痛快！痛快！”后来，身体发胖了，打不动网球了，但游泳一直坚持着。夏天，他总是挤时间到北戴河去，哪怕是两三天，也要领略一下大海的风浪。到了晚年，父亲还打太极拳、乒乓球和钓鱼。不过他钓鱼的技术实属下乘，主要是没有那个耐性。有一次，叶帅送来好几条大鱼，说是从中南海里钓的。父亲听了高兴地说：“我也去钓，钓了来吃！”星期天，父亲一大早就去钓鱼，这个地方坐五分钟，看看鱼不上钩，就说：“这个地方不行，恐怕没有鱼！”换个地方呆了不到十分钟，又着急了：“怎么老不上钩呢？！”不到一个小时换了四五个地方，一无所获。最后不耐烦了，对司机李叔叔说：“请你替我看着杆吧！我还是回

去下棋。”到了中午，李叔叔提着几条大鱼给父亲看，父亲很高兴地说：“还是你有办法。不过，我也赢了几盘棋呢！”

父亲还常常带我去看体育比赛。1965年苏军篮球队来访。第一场我们赢了，父亲很高兴，但对我说：“苏联人是大意失荆州，第二场就不好打了。”果然，第二场苏联队拼了命，赢了我们十多分。父亲的评论是：“我们还有差距，至少还要五年才能赶上去。”还有一次，父亲出国访问，贺龙伯伯到机场送行。临上飞机前，父亲突然对贺伯伯说：“你那个乒乓球女队这次能不能拿个冠军啊？如果拿了冠军，我请客。”贺伯伯大笑起来，高声答道：“那你就做好准备吧！”后来，女队真的拿了冠军，总理为此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招待国家乒乓球队。父亲即席讲话，头一句就是：“我是许了愿的，你们赢了要请客。不过这次是总理做东道主。……”那天，庄则栋、李富荣、徐寅生、张燮林、林慧卿、郑敏之等这些乒坛名将都去了，还做了表演，真让人大饱眼福。

父亲和他的同辈人

父亲曾对我讲过，在他小的时候，爷爷曾让父亲兄弟几人谈谈长大以后的志向。叔叔伯伯们有的要当县令，有的要做府尹。爷爷听了很高兴，让奶奶给他们一人煎一个荷包蛋。轮到父亲，他回答说：“我不

想当官。”爷爷一听，脸沉了下来，说父亲没有出息。父亲却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回答——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以平天下。爷爷拍案叫好，让奶奶煎两个荷包蛋以资奖励。父亲投身革命后，身经百战，历经坎坷，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他是很为自己的奋斗生涯而自豪的。但他有自知之明，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。他曾说过：“毛主席、周总理高瞻远瞩，掌握全局，领导革命走向胜利。比起他们，我差得远。我有过动摇，当然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也犯过错误。但是，在总的方面，我是能够贯彻党的路线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。”他爽朗易处，谦虚自抑。因此，在同辈人中人缘很好。

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探望邓妈妈，正好总理从外面回来，看见我们，就说：“刚才还同主席谈到陈总在国内外的访问呢！主席关心陈总的身体，我报告说陈总身体好，胃口好。主席却说：‘不见得吧？陈总胃口好就糟了，张茜同志听了一定不高兴。可别告诉张茜哟！’”我们听了，都笑起来。这些家庭琐事，主席、总理居然都知道啦！是呀，胃口好又怕发胖，是父亲最头痛的事。在饭桌上，母亲总是管着父亲：这个不能吃，那个要少吃。管得多了，父亲就会抱怨说：“不要干涉内政嘛！”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拿了个榴莲果到我家来，父亲叫妈妈和我一起来吃。我们闻不惯那种味道，谁也不动手，只是陪他们坐着。廖公劝我们说：“这是最好吃的东西，华侨吃了都不想回国，留连忘

返么！”父亲说：“不要管他们，我们可以多吃些。”说罢，两人食指大动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大榴莲就吃光了。他们意犹未尽，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莲汁蘸着往嘴里抹。母亲一下子跳起来，冲他们喊：“看看你们这个样子！就象小孩儿一样，脏死了！儿子在跟前坐着，你还真好意思吮手指头！”可他俩一边尴尬地笑着，一边加快速度蘸呀，抹呀。一会儿功夫，桌子给“打扫”得干干净净。

父亲对刘少奇伯伯是十分称赞的。记得1958年毛主席退居二线，刘少奇伯伯担任了国家主席，父亲问我们有什么想法。大哥回答：“感到有点儿突然。”父亲说：“这有什么突然呢？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，七大以来就是党的副主席，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。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嘛，他集中力量做理论工作，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。”后来父亲还说过：“少奇同志党性很强，在他那个位置上，能主动做自我批评很不容易。”

对林彪，父亲似乎是有过微辞的。1964年12月的一天，父亲和母亲叫我去看毛主席给林彪的信。毛主席手书了曹操的《龟虽寿》诗，勉励林彪养好身体。那时，全国都在学“三八作风”、“四个第一”，林彪是日方中天，炙手可热。他把主席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，分送政治局诸成员。父亲却对母亲漏了一句话：“只有他（指林彪）可以这样做，别人要是这样就是吹嘘自己。”显然，他对当时不

正常的党内生活是反感的。

最令我感慨难忘的是父亲和康生的关系。解放后，康生一直“不得志”，经常住院，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。父亲素来为人宽厚，认为他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同志，虽然有错误，但不应过于冷落他。在他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时候，父亲常去看望他。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。一次他请父亲和郭沫若吃饭。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砚台统统端出来，满满地摆了一客厅。他还详细地讲解什么是鱼眼，什么有水纹等，确实象博学之士。吃饭时，父亲、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谈阔论。我只记得他们先谈昭君出塞，好象是鼓动郭老写“翻案文章”。后来又谈诗词，我记下了最有趣的几首：

梅须逊雪三分白，
雪却输梅一段香。（宋，卢梅坡《雪梅》）

春梦暗随三日景，
晓寒瘦减一分花。（明，汤显祖《牡丹亭》）

偷来梨花三分白，
借得梅花一缕魂。（清，曹雪芹《红楼梦》）

那天父亲的兴致很高，他指着郭老和康生对我说：“他们都是大学问家，学识渊博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。”又对康生说：“我这个儿子比较迟钝，拜你为师如何？”康生满口答应。

可是，曾几何时，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，却欲置父亲于死地。八届十二中全会时，他恶毒诬蔑说 1959 年父亲要搞政变，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。父亲忍无可忍，最后上书毛主席，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，激愤地表示：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！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……。信递上去，围攻暂时停止了，但后来又背上“二月逆流黑干将”和“老右”的罪名，郁郁终生。“朝真暮伪何人辨”，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。象父亲那样竭诚待人，有时也许会吃亏，但终将被世人所称颂。而恩将仇报者，落井下石的好佞小人虽能讨得一时便宜，却最终为人民所不齿。

在 动 乱 中

对个人权位，父亲一向是看得淡的。文化革命之前二三年，父亲曾萌发过退休的念头。有一次从非洲访问回来，父亲感叹地对我说：“那些国家的外长比你大不了几岁！我这个老头子同他们打交道真有点吃不消。你可要珍惜大好时光呀！”后来我又亲耳听他对母亲说：“我真想退休！想趁有生之年办三件事：一是编诗集，二是出文集，三是写回忆录。我的诗都是兴之所至，随手而成，太粗糙，要好好斟酌一下，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。”母亲劝他：“现在就退下来算了。”父亲摇摇头答道：“我向总理提过，总理说现

在不行，等二三年以后再说。”然而，父亲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，他的梦想被无情地粉碎了。

文革开始时，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。最初，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，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。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，你应该积极地参加。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。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，容易犯错误，上坏人的当。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我管不了你，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。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，别人找你，你就说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们不要互相影响，互相牵连。”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。不久，我搬到学校去住，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。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，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，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。反正父子见了面，就知道彼此还好，没出大事。至于今后如何，也不去多想，“朝不虑夕”嘛！

1967年1月第一个周末，我刚回到家里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，现在情况复杂得很！”我说：“我在下厂劳动，没有乱跑呀！”父亲突然发火了，但并不是冲着我：“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？！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，党的第四号人物，昨天还在一起开会，今天就被打倒了。我是政治局委员，却一无所知。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，他们要搞垮我们的

觉。”听着父亲的话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过了一个月，情况似乎好了一点，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。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。他对母亲说：“谭老板（指谭震林叔叔）硬是有办法，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，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。”我听了也很高兴，似乎局势要好转了。可是，我们都太天真了。又过了三周，街上出现了“打倒二月逆流”的大字报，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，还打上了红叉。当周末我又回家时，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。父亲黯然地对我说：“这次我犯了大错误，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。我不是三反分子，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，我希望能改正错误，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。今后你要靠自己了，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，不让你进这个家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不要管我们，不要为我们担心，自己去闯。”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。我手里拿着存折，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。

但是，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，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。1967年初夏的一天，父亲晚饭吃得很少，一直愁眉不展。母亲关切地问：“不舒服了吗？”父亲缓缓地摇摇头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外交部没有人管，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！”父亲脸上浮出苦笑：“找主席？！现在恐怕不好见了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么找康生，他是分管外交的。”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：“找

他？！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，找他有什么用处。看来只好找总理，可是他的压力也大……”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。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、笑声朗朗的父亲吗？文化大革命才一年，他的两鬓全白了，步履蹒跚，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。我突然辛酸地感到，父亲显著地衰老了。

离 别

1968年初春，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甚嚣尘上。江青曾召见了我的一个同学，指使他同我接近，向我散布“联动”言论（即反中央文革的言论）。江青露骨地说：“就是要通过他（指我），揪出联动的总后台。”并要求我的同学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北京卫戍区汇报。那位同学不齿于这种特务手段，不但没有向卫戍区汇报什么情况，反而偷偷向我暗示：有人要整我的黑材料，要我警惕。早在文化革命初期，父亲就和我“划清了界线”，相约互不连累。然而，在那人妖混淆，是非颠倒的年月，谁都在劫难逃啊！

1968年4月13日是个星期六，我照例回家。父亲一见到我就问：“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找过你谈话？”我不明所以地回答：“没有呀！出了什么事吗？”父亲只是简单地回答：“噢，没什么。”第二天晚饭后，我正准备返回学校，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：总理要见我。父亲一边送我出门，一边问：“你在外面究竟干了些

什么？”我知道父亲在担心，就回答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干，爸爸，你放心。总理也许是要找我谈谈中学的运动，军训和复课闹革命。”父亲无言地、令人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意识到一定有什么非常的事情。到总理家时，总理正在会客厅等着，我叫了声：“周伯伯好！”总理严肃地端详了我一阵，突然问我：“你参加联动没有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！”“你有没有联动思想（指反对中央文革）？”总理追问。“有！”我毫不迟疑地回答。总理严肃的面庞竟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称赞说：“你很坦率，很好！”谈话的气氛缓和了。总理问到社会上关于我的一些谣言，我有些冲动地回答：“这些全是谣言！中央可以调查。”总理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时间了。”他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父亲处境很困难，社会上对你的传言又这么多，不论是真是假，总之对你和你父亲都很不利。坏人可能利用你搞你的父亲，你们父子会互相连累，懂吗？”我分辩说：“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，我干的事是好是坏同他没关系。”总理深沉地望着我说：“事情并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”他又换了个话头说：“你在父母身边长大，生活很优裕，没有吃过苦，不懂得工人、农民，应该到下面锻炼一下。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去经风雨见世面，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。你的父母都是很年轻时就参加革命，这点值得你学习。”接着，他告诉我：他已经同陈锡联同志联系好了，安排我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